

韩愈诗选

〔唐〕韩愈 著 王基伦 注析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家藏文库

韩愈诗选

〔唐〕韩愈 著 王基伦 注析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诗选 / (唐) 韩愈著 ; 王基伦注析.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6.7

(家藏文库)

ISBN 978-7-5348-6446-9

I. ①韩… II. ①韩… ②王… III. ①唐诗 - 诗集 IV. 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7694号

家藏文库：韩愈诗选

选题策划 卢欣欣 赵发杰
约稿统筹 卢欣欣
责任编辑 高林如 卢欣欣
责任校对 周 靖
封面设计 王 歌
版式设计 曾晶晶

出 版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450002
电话：0371-6578869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4印张
字 数 180千字
定 价 25.00元

前 言

本书依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次序，选注韩愈诗一百余首，约为其现存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1957年，钱仲联先生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此书，仿照宋人集解、间诂一类的纂述方法，采集多家论说，重新系年编排，当年即获好评。钱锺书先生曾对此书提供一些意见，更推崇仲联先生此书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此后学界赞誉声不断，肯定有嘉，迄今亦无更完整的善本。台北世界书局1966年再版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至2007年间也数度再版。本书考释详备，依年代排列诗作，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从了解韩文公的生平入手，进而了解韩诗的内容、作法，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探究其“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以及如何酝酿出才力充沛、想象雄奇、奇僻险奥的诗作风格。

在选注本书的过程中，选注者特别参考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代李汉编《昌黎先生集》，此外还有明代蒋之翘注《唐韩昌黎集》、清代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民国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日本学者清水茂注《韩愈》（岩波书店1958年）、原田宪雄《韩愈》（集英社1965年）等书，据此做了些文字校释和选取诗篇的工作。

梳理出以下几个切入点，先对韩愈及其诗歌加以介绍。

一、时代与生平

韩愈（768—824），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南）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谥“文”，又称“韩文公”。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今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韩愈出生在“安史之乱”平定（763）后的第五年，唐王朝已逐步走向衰落。他一生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其中宪宗元和年间，号称“中兴”，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百姓生活转好；但藩镇势力继续壮大，佛老流弊依然不减，整个国家仍处于政治黑暗、兵连祸结、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

韩愈三岁而孤，由长兄韩会和嫂夫人郑氏抚养。这个家庭浓厚的儒学背景和文学氛围对韩愈的成长历程有很大影响。他少年时代就发愤自励，勤学苦读，“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韩愈《答侯继书》）。德宗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他在这一年开始应举。经四次应试，至贞元八年才在陆贽门下及进士第，然而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试三次（贞元九、十、十一年）均落榜。贞元十二年，韩愈开始步入仕途，先是宣武节度使董晋表署为推官，后避汴州军乱，往依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观察推官。贞元十七年始选授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夏末，升任监察御史。这一年关中大旱，韩愈呈给德宗《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对官吏横征暴敛，请求朝廷宽免徭赋，结果被贬为岭南道阳山县令，这是韩愈首次自高位摔跌下来，上距就职御史台的时间不足半年，不久改江陵法曹参军。

韩愈求举失败及仕途坎坷的因素很多，朝中无权臣奥援是直接原因。他出仕于德宗末年，这正是以二王（叔文、伾）、刘（禹锡）、柳（宗元）

为代表的部分朝官与保守势力激烈对抗的时期。韩愈此时与政坛主流人物关系疏远，《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永贞行》二诗，以明显的嫉视态度表明对二王集团的不满，甚至一度怀疑柳、刘二人是促成他被贬阳山的帮凶。不过，真正贬官原因不详，此事乃韩愈单方面的误会，亦未影响日后韩、柳、刘三人的情谊。贞元后期的政风败坏，韩愈对前途倍感彷徨不安，在阳山令任内始终郁闷不乐。至宪宗元和元年（806），韩愈被召回朝廷，任国子博士；其后又有几次升迁转任，元和四年至七年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河南县令、尚书职方员外郎。仕宦至此时止，多在冷衙署办公，职卑钱少，抱负不得施展，以至落入“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进学解》）的极困顿窘境。上述可说是其早期仕宦生活的偃蹇时期。

宪宗元和八年，韩愈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从此步入高官的行列。是年，作《进学解》一吐胸中积郁，执政奇其才，转考功郎中、知制诰，始参与朝廷机要。元和十一年，迁中书舍人，寻降为太子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平淮西吴元济叛乱，奏为行军司马，以赞助谋划有功，升刑部侍郎，次年转兵部侍郎，这是韩愈一生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十四年正月，上《论佛骨表》，反对迎佛骨入禁中，触怒宪宗，贬潮州刺史，这是韩愈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大蹉跌。任后上表，陈情哀切，年末转袁州刺史。十五年被召回朝廷，拜国子祭酒。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再任兵部侍郎。二年二月，奉命往镇州宣抚兵变，回朝复命，转吏部侍郎。三年六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再任吏部侍郎。四年，卒，年五十七岁。

二、求学历程与文学主张

韩愈一生以承继儒道为职志，曾自叙求学历程说：“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

方。”（《与凤翔邢尚书书》）“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上宰相书》）可见在未能仕宦之前，韩愈实以读书著文之儒家生徒自居。他对文章尤有偏好，曾说：“虽愚且贱，其从事于文，实专且久。”（《上襄阳于相公书》）“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义训，反复乎句读，砉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

他的一些文章，如《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进学解》等更详述自己长期读书作文的体会。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对儒家经典十分重视，往往注意其文学内容与形式，并把儒家与后世文学家相提并论，如《进学解》谈到读书写作的心得：“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韩愈在博采古代文章的过程中，显然特别重视儒学与文学的结合，而不是后人所谓“文统”、“道统”之分。孙昌武《韩愈选集·前言》指出：“北齐高潜致杨遵彦书中说：‘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隋书》卷二《李德林传》）在唐人的观念中，经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的不同文章类型已区别得很清楚。但韩愈所重不在董仲舒和晁、贾的经术政论文章，而在两司马（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扬雄等文人创作。他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在《送孟东野序》里提到的历代“善鸣”、“能鸣”者中，汉代人中提到的也是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唐代则提出了陈子昂以下到张籍九位，都是文学家。他批评当世科举之文：“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

(《答崔立之书》)因此柳宗元也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柳河东集》卷三四)近人陈衍则说:‘昌黎虽倡言复古,起八代骈俪之衰,然实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艰深。注意于相如、子云,是其本旨。’(《石遗室论文》卷四)”对于韩愈的这种倾向,后人有各种评论,北宋程颐说他“倒学”,是“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语录》卷一一《遗书伊川先生语》)。南宋朱熹也说:韩柳用力处“只是要作好文章”,“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朱熹《沧州精舍谕学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陈衍《石遗室论文》卷四更明白强调:“昌黎长处,在聚精会神,用功数十年,所读古书,在在撷其菁华,在在效法,在在求脱化其面目。然天资不高,俗见颇重,自负见道,而于尧、舜、孔、孟之遣,实模糊出入。故其自命因文见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这类批评相当普遍,却忽略了韩愈诗文是对儒家学说的彻底实践的事实。

韩愈一心在发扬文学创作的传统,他注意到前代作家以“善鸣”、“出奇”胜场,因此他读书所重在“奇辞奥旨”兼顾:“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玕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其他相近的言论主张尚有:“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文丽而思深。”(《与祠部陆给事书》)“海含地负,放恣横从。”(《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文章语言,与事相侔。惮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这些体会有得之言,显示韩诗有深厚的内在学养,又必然走向奇、丽、深、劲的路途。正如他在《调张籍》一诗中所言:“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三、韩诗的分期与主要内容

韩诗大致可分为三期，汤贵仁《韩愈诗选注·前言》的说法是：“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韩愈中进士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留下的不多，艺术上也还不够成熟，但已显示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力。从贞元八年到元和五年（公元八一〇年）授河南县令，是韩愈一生的中期。这个阶段是韩愈仕途坎坷不定的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和诗歌创作日趋成熟的时期。……从元和六年（公元八一一年）入京任职方员外郎至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冬逝世，是韩愈一生的后期。……这一时期，他跻身于上层统治集团，政治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歌写作，除了坚持反对藩镇割据这一思想外，早期和中期的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逐渐减弱，但也不乏较深刻的社会意义的篇章如《泷吏》、《华山女》、《过鸿沟》等。”孙昌武《韩愈选集·前言》提出的分期看法与上述大同小异，但更能追探韩愈诗风转换的原因：“如果综观韩愈创作风格的演变就会发现，无论是诗还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朴者居多，‘尚奇’特色并不显著。雄奇变怪的追求是在贬阳山之后才明显起来的。而到了晚年，随着境遇心情的转变，诗文风格又渐趋平缓。特别表现在诗作上，元和十年以后雄肆奇古的长篇古诗很少写作了，而多写清新蕴藉的小诗。这个事实表明，韩愈尚奇，首先决定于他的思想意识。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郁结下的愤懑之气无可发泄，加上他又具有争奇好胜、不安凡庸的个性，这都促使他在创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学特征。”

检视汤、孙二人的说法，似以孙说为胜。盖贞元八年之前韩愈诗作太少，实难与后来比拟。贞元十九年十二月被贬阳山，内心愤慨不平，对其诗风的影响十分明显。宪宗元和六年韩愈虽返京任职，但生活依然困穷，至元和九年始位居要津，心境日趋坦然自适。以此时为后期的分界，较合

乎韩诗风格转变的实际情形。罗宗强等《隋唐五代文学史》第六编第二章第五节《尚怪奇——韩愈的诗（二）》也说：“韩愈那些追求怪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出现于贞元后期到元和年间，此前他的诗风是以叙述写实为主的。”此处肯定韩诗“怪奇”诗风出现于贞元后期，故汤贵仁关于中期开始于“贞元八年”的说法，不如孙昌武、罗宗强“贬阳山之后”的说法来得恰当；而其结束于元和年间的说法，则汤、孙、罗三书说法相近。

综合上述说法，显然韩愈一生仕途坎坷，势必产生许多抒发个人怨愤的作品。他对当时政治黑暗和社会动乱带给百姓的苦难有深刻的感受，反映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也成为他诗歌的一大主题。如《龊龊》、《归彭城》写东郡水灾，《赴江陵途中》写关中旱情，《宿曾江口示侄孙湘》写三江水区百姓的困境，表现了对百姓的同情和“排云上阊阖”、“上陈人疾苦”的意愿。又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写出地方官作威作福，使一些正直臣子返京无望，为自己宦海浮沉的遭遇长歌恸哭。《咏雪赠张籍》以委婉深沉的笔触批判德宗末年的弊政，《永贞行》明白指斥二王革新集团的不当作为。其他如《丰陵行》不满皇帝葬仪的奢靡，《华山女》揭露道教清修的虚伪，《送灵师》抨击迷信佛教的蠹国败俗。这类诗作伴随其一生，数量最多，只是晚年稍减而已。

韩愈诗文的雄奇怪变，既然深受一生际遇的影响，因此争奇好胜不仅表现在字句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内容，奇在境界。这一点可于描写壮丽山河的歌咏看出，这一类诗作是韩诗中写得很有特色的篇章。钱仲联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前言》中举例说：“《南山诗》洋洋大篇，写终南山全貌；《送惠师》、《送灵师》、《此日足可惜》、《谒衡岳庙》、《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岳阳楼别窦司直》、《答张彻》、《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等篇中有描写天台观日、瞿塘遇险、

黄河夜渡、雾后登岳、湘山夜景、洞庭风浪、华山绝险、太行瀑布的片断，用雄伟瑰异的笔墨，在读者面前展现了魅人的画卷。”其实，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风》）、燎原的大火（《陆浑山火》），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岫嵎山》）、人迹罕至的古刹（《山石》），景象的如此不凡，正流露出诗人不平静的心声。其中《岳阳楼别窦司直》以大笔重彩写洞庭湖的汹涌波涛，善于描绘惊心动魄的奇异景象，以之衬托对时政的感慨和内心之不平。《山石》诗大笔淋漓，形象鲜明，而文意流畅，不见斧凿痕迹，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韩愈诗作的第三大内容，应是一些叙琐事、写微物的短小诗篇，这类作品，刻画事物形象生动，描绘情态体贴入微，于青壮年时期偶有佳作，至晚年更多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具有“一往清切，愈朴愈真，耐人吟讽”（方东树《昭昧詹言》）的特点。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前言》举例说：“《郑群赠簪》、《赤藤杖歌》赞颂了手工艺者的精制，《听颖师弹琴》表现音乐的形象性和它强烈的感染力，都是这方面的佳作。《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雉带箭》写击球打猎，而归结到习战杀贼的谋略，或兼喻赋诗作文的构思；《短灯檠歌》通过长檠短檠及有关人事的对照，表现了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石鼓歌》刻划斓斑古色的文物，隐含着对陋儒的嘲弄和对中朝大官的讽刺。”这些都是前人诗集中罕见的内容。他如《戏题牡丹》的朦胧隐约，《榴花》、《池上絮》的含蕴隽永，《闲游》、《独钓》的清新细腻，《落齿》、《杏花》、《李花二首》、《叉鱼》、《桃源图》、《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南溪始泛三首》，莫不因事物起兴，别有一番由小见大、追求悠闲生活的风味。韩愈晚年诗风转变甚大，许多律绝明白流畅，不仅景物形象饱满，生活态度也优裕自如，全无老气横秋的迟暮习气。游国恩等《新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九章第一节《韩孟诗派》说：“可惜前人对这一类作品注意得不够。”从中期至晚期，无论刻意锤炼，

或是妙手偶得，韩诗皆有不同的艺术成就。

四、韩愈“以文为诗”及其诗歌特色

韩愈承袭杜甫之后，勇于大胆创新诗歌形式，对当时的诗坛起了推陈出新、独辟蹊径的作用，前人一致公认其作法为“以文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曾说：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概括言之就是“以文为诗”，韩愈实开此风气的先河。

所谓的“以文为诗”的“文”，含义是相当广的。它可以是指“文字”或是“才学”、“议论”，前者较接近变换调整文字的手法，运用险韵、奇字、古句、方言，以达到富有古音之目的。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说：“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恒蹇之巧。”黄子云《野鸿诗的》说：“昌黎极有古音……盘空硬语，以文入诗。”（参见《清诗话》）才学、议论较接近学习古道的精神，运用《诗经》、《楚骚》等内容，达到富有古调之目的。陈沆《诗比兴笺》卷四说：“昌黎不特约六经以为文，亦直约《风》、《骚》以成诗。”意即指此。

归纳各家说法，历代“以文为诗”的定义有如下四种：（一）变句脉：例如七言诗上四下三句法，变成上三下四句法。此说由宋张耒、清赵翼提出。（二）以赋为诗：取汉赋铺叙而无含蓄的方法作诗。此说由宋晁以道，清沈德潜、方东树、赵翼提出。（三）以古文章法、古文手笔（或笔力）作诗：如章法剪裁、叙写简妙之类。此说由清方东树、许印芳提出。（四）以议论作诗：此说由清顾嗣立提出。（参阅罗联添《论韩愈古文几个问题》，《汉学研究》九卷二期）

韩诗特点即由“以文为诗”而来。以“变句脉”来说：韩愈破坏诗歌的规范，打破句式工稳的外在形式，使之松动变形。他引进散文、骈赋的句法，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像《忽忽》开头一句

是“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全是散文句法，却又给人以一种发自肺腑的叹息似的震撼，以下各句又采用十一、七、三、七、七的句法。又如《南山诗》中“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雉”，“或靡然东注”、“或行而不辍”、“或遗而不收”等，也常见一、四句式。其他如：“曰吾儿可憎。”（《读东方朔杂事》）“在纺织耕耘。”（《谢自然诗》）“若饮水救渴。”（《送文畅师》）亦是一、四句法。有的则是上三下二，如：“知音者诚希。”（《知音者诚希》）“淮之水舒舒。”（《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有的则是上三下四，如：“溺厥邑囚之昆仑。”“维欲悔舌不可扞。”（《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落以斧引以缠徽。”“嗟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时若发机。”（《送区弘南归》）这些诗句，散文化的程度很彻底，成为拗折刚硬的另一种审美形态。

在散文化的句式里，韩愈大量应用虚词，使用之广，亦是前所未见，所、其、之、哉、矣、乃、耳等主要文言虚词，在韩诗中俯拾即是。如：“乃与夫子亲。”（《北极一首赠李观》）“苟异于此道。”（《谢自然诗》）“遨嬉未云几。”（《杂诗》）“惟子能谄耳，诸人得语哉！”（《咏雪赠张籍》）“次第知落矣。”（《落齿》）“巨灵高其棒。”（《题炭谷湫祠堂》）“后日更老谁论哉？”（《李花赠张十一署》）“诗成使之写。”（《醉赠张秘书》）“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此来告良有以。”（《寄卢仝》）“放纵是谁之过欤？”“不从而诛未晚耳。”（《谁氏子》）“心之纷乱谁能删。”（《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固以听所为。”（《病鸱》）这些虚词的使用，使诗的稳定意脉发生了变化，令人感到惊讶、陌生，也令人感到新奇、为之注目，助成了诗歌刚健的语气和纡徐曲折的态势。

再就“以赋为诗”来说：韩愈擅长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创作诗歌，改变了大历、贞元以来诗坛描写景物纤巧卑弱的现象。韩诗大都气势磅礴，风云再造，如《南山诗》写了俯瞰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

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领头，句中用“若”字比拟的句型，又连用十四个叠字，大规模地用种种形象来比喻南山，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在五言诗中开创了长篇句法，构成了多彩多姿的风景图。《听颖师弹琴》也以种种形象来比喻琴声，成为名篇。《荐士》、《送区弘南归》、《孟东野失子》也用一连串具体事物做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忽忽》写对于人生幻变的感受，“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竟然把哀愁的情绪写得雄壮悲怆。又如《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有四句描绘瀑布：“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描写瀑布横空出世，颇有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意味，而力度则过之。《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描述一场山火：“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弛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鼉龟鱼与鼃，鸱鸢雕鹰雉鹄鹑，焞焞煨燔孰飞奔。”这首诗也写得奇怪诡异，气势慑人。韩愈在写诗时，有意采用汉赋的铺陈手法，博喻的长篇赋体排句和超越现实的游仙式想象，在诗中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道。晚唐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说：“愚尝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司空表圣文集·题柳柳州集后》）

韩愈得自汉赋的另一种创作方式，就是常用怪辞，创造“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荐士》）的语言风格，特意搜求色彩奇丽、意象新颖、突兀怪诞的词语。首先是《寄卢仝》、《泷吏》等诗多用方言、口语，如“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明白如话。其次如《永贞行》中“狐鸣枭噪”、“暘睽跳踉”、“火齐磊落”、“蛊虫群飞”、“雄虺毒螫”，《送无本师归范阳》中“众鬼囚大幽”、“鲸鹏相摩宰”、“奸穷怪变得”这一类描写，以及“央央”、“闾闾”、“兀兀”、“喁喁”等叠字，都有些匪夷所

思，光怪陆离；过去人们认为令人厌恶的（鬼、妖、阴风、蛤蟆、蝎子、毒螫）、不愉快的（如腹泻、打呼噜、牙齿脱落、眼花、头秃、腥臊入口）、惨淡的（如蛮荒、死亡、黑暗）事物和景象，对韩愈而言都是素材，甚至常以这一类素材构造诗的意境。例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写寺院壁画“光华闪壁见神鬼……”，虽然写来奇奇怪怪，但也确实呈现出惊天动地的鬼神气势，表现了诗人在夜赏壁画时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撼。此外，为了表现强力怒张的怪奇境界，韩愈喜欢搜求富有力感的语词，例如“大肉硬饼如刀截”、“两翅久不擘”、“仰见突兀撑青空”、“訇哮簸陵丘”、“天跳地踔颠乾坤”等。他也好用舂、撞、劈、馋、崩、刮、斫、掞、坼裂……这一类的动词。这些词语或狠重，或迅捷，或斩绝，或剧烈，有许多生僻字眼，自然带出怪奇的意味，甚至呈现拗折艰涩的形态。有时用字过于生僻，甚至出现连续数句诗全用冷僻字堆砌而成的现象，如《城南联句》长达一百五十韵、一千五百字，充满僻词涩语，这就与文学的审美意义相去甚远了。

最后，就“以古文章法作诗”来说。韩愈的五七言古诗，有的几乎通篇散行，极少骈俪对仗，《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即是。他的《南山诗》共一百零二韵，一千多字，全诗极力铺陈，有似大赋，却又层次严密，顿挫逶迤，整体结构基本上是散文章法。再如著名的《山石》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单行顺序，以时间为序，从行至山寺、登堂所见、夜看壁画、铺床用餐、夜卧所闻所见，到天明下山、临流濯足、抒发感慨，娓娓道来，让人身历其境。诗中的断、转、衔接，自然延展，以一幅幅融时空为一体的山寺景观构成浓淡明暗变化、清健疏朗的诗境。《嗟哉董生行》似仿效古乐府之长短句，又似运用质直的散文句式，几乎可以当作一篇记述人物的散文读。此诗与韩愈《送董邵南序》合读，更易明了董生之为人，实乃相辅相成之作品。《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被方东

树《昭昧詹言》称为“一篇古文章法”，全诗首尾都是实写，写眼前行乐；中间一大段张署的歌词是虚写，写昔日谪迁之苦。从文章的表面逻辑看来，人所歌的昔日哀景，是被否定了的陪衬之意；我所歌的眼前乐景，是结论性的主题。但从实际的情感逻辑看来，昔日的患难哀愁，才是真正要追溯的主题；眼前的反面行乐，不过是故作宽解，大笔反衬，以加强主题。文章布局有实有虚，主题有宾与主、反与正，虚实相生、以宾显主的写法皆常见于古文，而韩诗常有之。他如《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古意》、《岫嵎山》等诗也运用了古文章法之妙。

五、结语

综上所述，韩愈诗歌的主要特色就是气势宏伟、奇崛险怪，此一特点突出体现于其描写景物的大量作品中。分而言之，一是在诗的内容上，通过“狠重奇险”的努力方式，追求“不美之美”；一是在诗的形式上，通过散文化的风格，追求“非诗之诗”。前者又有两种情形，其一是把不美的对象写得生动有趣，如《落齿》、《送侯参军赴河中幕》、《赠刘师服》；其二是事物本不丑，却将其丑化，如《和侯协律咏笋》写众蛇揽聚，《昼月》写月之沾上泥垢。早期他创作了许多仕路写实的作品，伴随着两度被贬岭南，这类诗作，至晚年仍不衰。中期作品以追求怪奇为目标，这是受了阳山之贬的刺激，也与他“穷苦之言易好”、“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相符合。尚怪奇与散文化的创作手法相结合，构成了韩诗以僻字、拗句、重韵、险意的健笔硬笔，写出雄、奇、壮、伟、怪、变为主的独特风格，这类作品实以五古、七古独多，也是他一生诗作的最大成就。到了晚年，韩愈转写一些律绝，古诗也短小清新，这些和平冲淡的作品未受前人重视，却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好诗。

目 录

早期：平正古朴

(德宗贞元二年至贞元十八年，786—802)

条山苍	3
孟生诗	3
古风	8
谢自然诗	9
答孟郊	12
醉留东野	14
知音者诚希	16
汴州乱二首	17
嗟哉董生行	18
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	20
龊龊	25
忽忽	26
雉带箭	27